

朝鲜通史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朝鲜通史

上卷（第二分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通史》翻译组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八章 高丽的统一国土， 中央集权制的发展

第一节 高丽推行的统一政策

十世纪初的国内形势和高丽王朝的对内政策 以统一国土为己任的王建，在宣告新王朝成立后，一方面，继续推进收复高句丽故地的事业，另一方面，被迫对顽强坚持反对封建割据和残酷剥削斗争的人民作出一定的“让步”。他在即位的第二天，就以诏书的形式，揭露由于弓裔的暴政造成人口缩减和土地荒废的现象，并向国内外宣布废除非法的剥削和掠夺，以安定人们的生活。为此，王建还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诸如大幅度地削减泰封国末年一顷地多达六石的田租，对自己领土内的人民免收三年租税等，以使人民安心生产。

新罗末期的“压良为贱”^①，使人民遭受更残酷的封建奴役。人民为恢复原来的身分和反对残酷压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建不得不尽快地对他们作出“让步”。918年8月，王建就下诏书，责令各地对“压良为贱”的良人情况调查上报，并用国家钱款赎回一千多名“压良为贱”的奴婢，恢复他们的良人身分。这项工作持续了相当时间。

高丽初期国家采取的这种措施，是人民长期不渝的斗争结果。同时，这也是符合高丽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减少国家控制外的奴婢和增加直接属于国家的良人，可以迅速加强国家权力，使国家可以在此基础上迅速完成统一大业。

王建为了安抚奴婢，使之不反抗和增加农业生产，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他把王宫的奴婢，留下一定数量，其余的都迁到城郊，令其从事农业生产，并向他们征收租税。迁到郊外的奴婢虽仍属于王室贵族，但他们的处境与良人农民已相差无几。

① 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封建地主霸占良人，当作私奴婢使用，叫做压良为贱。——译者

封建政府的这些怀柔政策，当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处境，但对安定人民生活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高丽政府除了这样收揽民心外，为争取高丽王朝开国功臣更积极的支持，为把割据各地的诸小封建势力置于自己的统治下也做了巨大的努力。

新罗末期以来，在新出现的许多中小封建势力中，固然有些人想只靠自己的力量扩张势力，但多数由于受到人民大众反对割据和由此加重的剥削而进行斗争的强大压力，想要投靠更大的势力，借以维持自己的势力。因此，中小封建势力动摇不定，或向后百济，或向高丽寻找他们的靠山。

918年8月，王建赏赐数千臣僚以大量金银财宝，同时，颁布诏令说：“朕虑：诸道寇贼闻朕初即位，或构边患，分遣单使，重币卑辞，以示惠和之意”^①，并采取一些实际措施。这种积极的怀柔政策果然奏效，得到许多地方封建势力的支

^① 见朝鲜《高丽史》卷一，世家卷第一，太祖一。——译者

持。

920年从远地康州(现在的晋州^①)归附的“将军”闰雄和922年主动投诚的真宝(现在的青松郡^②)“城主”洪术就是其中的代表。

王建对于主动投诚的“城主”、“将军”等诸小封建势力,都授予高官厚禄,并承认他们对原辖区内的土地和人民有统治权。

在“城主”、“将军”归附高丽王朝以后,他们统治下的人民生活也逐步安定下来。

高丽王朝不仅对诸小封建势力,而且对新罗王朝和甄萱的后百济也采取了积极的怀柔政策。新罗王朝虽已衰弱到不能维持国家体统,但王建却与后百济的甄萱不同,对新罗王朝不仅不急于采取军事行动,反而与新罗交换友好使节。高丽有时还应新罗王朝的请求,出动军队“保护”新罗,使之免遭女真人的海盗侵略和后百济的威胁,因而得到新罗贵族及其统治下的人民的积极支持。

但是,除位于半岛西南部的后百济外,各地

① 在朝鲜庆尚南道。——译者

② 在朝鲜庆尚北道。——译者

还有无数诸小封建势力反抗高丽的统一大业。为翦除这些反抗势力，完成统一大业，高丽还需进行十年左右的艰苦斗争。而这一事业，只有能满足人民反对残酷封建剥削、渴望克服分裂、实现统一的愿望的人才能完成。

与高丽对抗的代表势力是后百济。后百济的甄萱与高丽不同，他加紧剥削人民，千方百计地企图用武力征服新罗王朝，甚至采取联合中国大陆的吴越和后唐，借用它们力量的愚蠢办法。这与当时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但甄萱对高丽却不敢轻易动用武力，时常派遣友好“使节”，表面采取和睦态度。所以，高丽王朝成立后的七八年间，高丽同后百济的关系虽很紧张，但开始尚未发生直接的大规模冲突。

924年至925年，由于后百济进攻曹物城，两国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但这次冲突也由于高丽太祖的提议，以交换人质，实现了正式和解，避免了战争的扩大。

919年高丽政府迁都开京。开京位于半岛西部中心，地处要冲，是王氏势力的根据地。

建设首都开京，是高丽政府慎重的内外政策

的一个表现，也是提高高丽王朝威望、改变民心的政策的一环。

王建为实现半岛的统一，倾注了更多精力的是如何收复大同江以北的高句丽故地，而不是用武力去征服后百济和新罗王朝。

十世纪初的国际形势，收复高句丽故地事业的发展 弓裔自称高句丽的继承者，早在泰封国成立以前，就着手开拓大同江以北地区。继泰封国而起的王建，也自称为高句丽的继承者，连国号也称为高丽，并把收复大同江以北的高句丽故地作为新王朝的最重要的任务。王建的这种立场，与十世纪初西北方的形势是分不开的。

这也是当时人民的一致愿望。早从新罗末期就有许多人来到高句丽故地，进行开拓。

九世纪末十世纪初，中国大陆由于唐末农民大起义和接踵而来的五代诸国的兴起，处于大混乱时期。中国大陆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北方内蒙古地区契丹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向渤海的入侵，呈现了不祥之兆。

契丹族居于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过着游牧生活。到唐朝末年，以耶律阿保机酋长为

首的契丹族征服动乱的中国边防地区，获得大批俘虏和财物，同时实现了契丹的迅速统一，到916年终于宣布成立国家，耶律阿保机被推为皇帝。

契丹是个游牧部落，不从事费力的生产，而以征服为业，好掠夺。契丹征服者在916年建国后，更加扩大征服事业，控制了包括现在北京在内的北中国一带，并开始向东方的渤海入侵。

这时渤海的国力难以抵御契丹的征服，满洲一带也逐渐陷于动乱状态。

在渤海与新兴的高丽间夹居的女真人，经常侵犯高丽北部，而且与各国的关系忽善忽恶，变幻无常。

在新兴的高丽北方出现这样复杂的形势，以王建为首的高丽执政者深切关心大同江以北的高句丽故地的收复事业，决心进一步加强对北方的警备，这是为完成统一大业和保障国家安全必需的和迫切的措施。

高丽选择了原高句丽的都城平壤，作为开拓西北的根据地和对付大陆的军事、政治中心，并早在918年9月就着手西京（平壤）的建设。

王建颁布诏书说：“平壤古都荒废虽久，基址

尚存，而荆棘滋茂，蕃人游猎于其间，因而，侵掠边邑为害大矣。宜徙民实之，以固藩屏，为百世之利。”^①后来，王建便将现在黄海南北道一带的人民迁到平壤，定平壤为大都护府，派堂弟式廉和广平侍郎列评驻守该地。翌年在平壤修筑城郭，922年又把开京以南各邑^②的两班子女和人民迁到平壤，并进一步加强平壤的建设及其警备。从此，平壤称为西京而被重视起来。

西京设置统治机构“分司”，配备文武官员，并设御史分台以监督这些官吏。

相传王建在给他后代留下的训要中说：“西京水德调顺，为我国地脉之根本，大业万代之地，宜当四仲巡驻，留过百日，以致安宁。”^③可见高丽王朝一开始就很重视西京。

高丽政府在重建西京的同时，全力推进开拓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的事业。

919年开拓龙冈县（现在的龙冈^④），920年开

①③ 均见朝鲜《高丽史》卷一、二，世家卷第一、二，太祖一、二。——译者

② 府、州、郡、县等地方行政单位或这些行政单位的所在地统称为邑。——译者

④ 在朝鲜平安南道。——译者

拓咸从县（现在的江西郡^①），并分别修筑城郭，922年着手修筑西京在城，925年已开拓成州（现在的成川郡^②）和汤井郡（现在的阳德郡^③）一带，并分别修筑城郭。这时，庚黔弼也率领军队向东北地方推进，开拓了现在的安边^④以北地区。

这时期开拓我国东北地区的巨大成就，是高丽人民不畏艰难付出高昂的劳动代价取得的，是我们祖先在祖国历史上建立的伟大功勋。

高丽收复高句丽故地事业的迅速进展，显著地提高了高丽的国际威望，同时，对诸小封建势力的翦除也就更加容易。随着高丽国威的逐渐提高，相邻的女真人往往数以百计地前来归顺，甚至有个别人，远从吴越国，寻找安身之地，到高丽来定居。

922年契丹使节带着骆驼和毡布到高丽要求建交。这时正是契丹对渤海加紧施加压力的时期。

高丽一直把渤海当作同族国家，警惕地注视着正在加紧侵略渤海的契丹的动向。因此，922

①②③ 均在朝鲜平安南道。——译者

④ 在朝鲜江原道。——译者

年对契丹的建交要求，高丽未予任何答复，只是更加紧开拓西部地区，并加强对该地的警备。

第二节 渤海王朝的灭亡及其 遗民为收复故地的斗争

渤海王朝的灭亡 渤海国持续了二百来年的繁荣昌盛，到九世纪末十世纪初，政治上急遽衰落。

渤海有势力的贵族在各地都拥有许多村庄和人民。他们不受国家的管辖，肆意压榨人民。在中央，他们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此外，各地还有不少大小豪族，不受中央统辖，处于割据状态。这就使渤海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极度削弱，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与此同时，契丹人在渤海西部辽河流域迅速兴起，积极向外扩张，成为危害渤海国安全的很大威胁。由于契丹人的频繁入侵，渤海国早在十世纪初就已连续遭受莫大损害，特别是916年契丹酋长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元后，形势就更加危

急。

918年契丹人又大举入侵渤海，掠走大批居民。渤海为此在924年攻克契丹的辽州，杀其刺史，掠回相当数量的居民。但这时的渤海国，中央集权业已削弱，国内情况日趋恶化。

渤海为争取外援，加强对抗契丹的力量，向南方新成立的高丽和西方的后梁、后唐，甚至向遥远的吴越派遣使臣要求建立同盟。这时，同族国家高丽太祖王建特别关心北方，为抑制契丹、支持渤海曾做了很大努力，但因当时国内尚未统一，未能直接派兵支援。至于后梁、后唐等，这时正处于自顾不暇的境地，对渤海也无力进行帮助。

在这种形势下，契丹人完成侵略准备后，于925年12月在太祖阿保机的统率下，突然大举入侵渤海，包围了西部扶余城（现在的农安）。扶余城的军民因当时国内政治不统一和国防松弛，得不到外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虽然充分发扬英雄主义精神，进行了英勇斗争，但扶余城终于在翌年即926年正月为敌所破。契丹人又向王京龙泉府进犯，渤海老相（首相）的部队在中途阻

击，但也遭到失败。契丹人继续入侵，当月包围上京。

首都上京的全体军民为挽救国家危机，发扬无比的英勇牺牲精神，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战斗。国王和贵族官僚却惧敌之攻势，慌忙出城向契丹军投降。可是城里的军民依然与力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军进行殊死搏斗，直至最后一人，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

首都被占后，各地的重要城邑并未投降，依然长期坚持抗战。安边、鄭颉、定理三府的军民于当年3月和5月，铁州军民于7月，分别奋起抗战，与敌进行英勇斗争。长岭府军民从3月到8月的整整六个月期间，在敌人重兵包围下，不畏各种艰难险阻顽强斗争。8月，理瑛王的弟弟率领的部队攻打敌人占领的扶余城，重创守城敌军。

渤海各地军民虽然这样英勇地坚持反对契丹侵略者的斗争，但它本身存在很大弱点。早在战争很久以前就已经暴露出来的渤海封建统治阶级的封建的分散性，在反对契丹人的斗争中起了极为消极的作用。各城邑分散进行的斗争，由于未能实现联合，汇成全国性抗敌洪流，最后为敌人各个击

破，终归失败。

国内百余座城镇皆为敌人占领，926年渤海王朝遂告灭亡。渤海王朝自698年高王（大祚荣）即位到灭亡，历时二百二十九年。

渤海王朝灭亡后遗民集团的离散及其为恢复故国的斗争 契丹虽然灭了渤海王朝，但因当时与渤海人的力量悬殊，对其未能立即施行州县制度，而采取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

契丹太祖阿保机在926年灭渤海不久，便将渤海国改为“东丹国”，并封长子突欲为“人皇王”统治该国，“东丹国”遂成为契丹的一个“属国”。但“东丹国”除王和他的下属几个高级官职由契丹人充当外，仍然保持过去的官制，保留渤海人官吏。在军制方面，虽设有契丹军队以镇压渤海人，但也保存了完全由渤海人组成的强有力的军队，并委任渤海贵族将军统率。东丹国每年要向契丹缴纳相当数量的岁币（纳贡），但也保持一定的相对独立性。

928年，契丹把自己原来的领地辽州（现在的辽阳，后升级为南京，不久又改称为东京）定为东丹国的首都，同时以此为中心，把数十万渤海

人迁到辽河左岸一带。这时，原渤海国的各地居民大体上都按原行政区域迁移。契丹之所以采取这一措施，是出于这样一种设想，即与其将刚强的渤海居民留在远方，不如迁到离契丹较近的地方，既便于控制，又能借以加强与南方汉族国家对抗的力量。当时，对契丹人来说，突厥、唐项、室韦等部落是右翼防线，而东丹即渤海则为左翼防线。

契丹鉴于当时的各种条件，为了贯彻对渤海人的政策，不能不对他们作出相当的让步。首先，在经济上，采取和契丹本国不同的政策，盐酒税和市场税一概免征，从而大大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在其他租税制度方面，也实行相当宽大的政策。一般看来，辽河流域与遥远的东北地区相较，气候水土各种条件都更为良好，盐、铁也很丰富。渤海人把这次迁移看作是回到自己祖先高句丽人居住过的地区。

渤海人迁到辽河流域以后仍保持政治、军事上的相对独立性。对内虽用东丹国这个名称，但对外则和以前渤海时期一样，还是独立地同中国及其他各国交往和贸易，正式国名有时也仍然用渤

海国。个别人出国时，仍自称渤海人。

这个所谓东丹国的居民，就是渤海王朝灭亡后大量迁移的第一个渤海遗民集团。他们虽在征服者契丹人的统治下，但仍保持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正因为这样，他们根据自己的地位和力量，经常图谋完全的独立。

另一方面，渤海王朝灭亡后不久，很多渤海人坚决反抗契丹人的压迫，反对迁往辽河流域，而大批迁往高丽国。926年2月（即上京陷落后不久），渤海末代王的世子大光显带领数万居民投奔高丽，其后数十年间，约有十余万渤海人迁入高丽。在这些移民中，有很多是原渤海国的大臣、将军、学者等贵族。

迁到高丽的渤海居民认为，与其受异族契丹人的压制，不如归属同族国家高丽过安宁的生活。同时，他们始终怀着一种迫切的愿望，即在高丽国家的帮助下，一俟时机成熟，就收复自己的国土，重获独立。高丽人一方面把渤海人的投奔看作是自己同族的归还，另一方面，与他们一起站在反对共同敌人契丹侵略者的立场，通力合作，试图借以实现恢复高句丽故地的远大计划。